

从书籍史看全民阅读

何朝晖

提示 书籍史上经历了从精英阅读到大众阅读的演变。书籍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阅读活动,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,阅读只是少数上层人物的专利,普通百姓则很难有机会识字读书的。全民阅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,今天的全民阅读局面得之不易,历史上优秀的阅读传统和读书方法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。

早期,只有官府才藏有书籍,春秋时期书籍和学问开始向民间扩散,到战国时出现了“学富五车”的惠施,“陈篋数十”的苏秦这样的藏书家。宋代以前,书籍和阅读基本上被士阶层垄断,普通百姓是很难有机会识字读书的。虽然古书里有不少贫寒子弟勤力学苦读的故事,但这恰恰说明这种情况并不普遍。

就书籍的种类而言,除了士大夫阶层阅读的经史、诸子、类书、诗文等书外,还有蒙童读物,但也是为进入士人阶层做准备而阅读的。元、明之后,出现了以普通大众为目标读者的读物。元代出现了讲史平话,把说书人在瓦肆勾栏里说演的故事记录下来,变成供大众阅读的案头文学。明代是一个通俗文学大繁荣的时代,出现了大量的通俗白话小说,

以及灯谜、酒令、笑话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出版物。此外还出版了种类繁多的日常生活指导手册——“日用类书”,指导人们如何写信、写请柬、写对联、拟契约,如何操办婚丧嫁娶,甚至如何旅行、下棋。书籍和阅读脱离,了文人的掌控,向具备一定识字能力的社会大众普及、延伸。到了清代,普通百姓接触书籍的渠道进一步拓宽。闽西山区的四堡,是一个专门向岭南乡村的客家人聚居区提供廉价读物的坊刻中心。在北方,馒头铺兼营租书业务,普通百姓可以用很低的价格租书来看。“百本张”在庙会集市上兜售廉价的戏曲、曲艺唱本。宝文堂书店把通俗小说化整为零出版,价格低到老百姓可以拿鸡蛋来换,被称为“鸡蛋书”。在史料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普通百姓读书的场景。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业科技著作,里面有一种灌溉用的机械“翻车”的插图,画中一个戴着斗笠的农民,一边脚踩翻车,一边手把一卷阅读。笔者曾在博物馆看到一件名为“读书公仔”的清代广东产外销瓷器,造型是一个毛头小伙拿着一册书聚精会神地读。可以说明清进入了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,但是不是全民阅读呢?不能这么说,因为当时识字率比较低,还存在大量的文盲,尤其是妇女的识字率相当低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大力普及教育,使得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有能力、有余力买书、读书,全民阅读的时代真正到来。

中国古代非常强调读书要抓住重点,强调熟读精思。在书籍开始逐渐增多的汉代,扬雄在《法言》中指出:“好书而不要诸仲尼,书肆也。”提出读书不可汗漫无所守,要以儒家经典为中心。在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朱子读书法,就是一种精读典籍的方法。朱子是指宋代大儒朱熹,朱熹弟子辅广将朱子读书法概括为6条:“居敬持志,循序渐进,熟读精思,虚心涵泳,切己体察,着紧用力。”前两条是说读书态度要端正,方法要得当;中间两条是说要精读、熟读,把握书中的精义;最后两条是说读书要凝聚精神,把书中的道理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,身体力行,注重实践。朱熹提出读书要“宽着期限,紧着课程”,即不管花多少时间一定要把书中的知识道理掌握透彻。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读书生活很有启发意义。

读书不仅要熟读经典,也要博览群书,如何处理精读和泛读之间的关系呢?古人在这一问题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参考。古人认为,阅读要从少量经典的精读出发,逐渐扩展,进而形成比较完备合理的知识体系。元朝人程端礼的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就是这样——从精读到泛读的读书规划。明清之际的陆世仪提出的读书法,更清楚地反映了古人读书的阶段性。陆世仪提出一个从5岁到35岁的30年读书方案:第一个10年为“诵读”,熟读四书五经、诗文名篇等经典文献;第二个10年为“讲贯”,重点是对经典文义、经史大义的理解掌握;第三个

10年为“涉猎”,即广泛浏览天文、地理、兵家、农学等著作。对这个从精读到泛读的阅读策略,近代曾国藩用打仗和做生意作了十分生动的比喻,他把阅读分为“读书”和“看书”,前者是精读,是根本,如“深沟坚垒”“在家慎守”,后者是泛览、是拓展,如“攻城略地”“在外贸易”。今天我们的阅读活动不必以儒家经典为核心,我们的读书范围极大地扩展了,但面对种类繁多的书籍如何选择,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阅读策略则是古今一致的。我们今天面临复杂得多的阅读环境,国学、西学杂糅,古典、现代并置,传统纸媒与新兴媒体并驾齐驱,我们更加需要阅读策略方面的指引,根据读者的不同需要提供合理的阅读方案。在这一过程中,传统是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。

根据近两年的调查,大部分中国成年人在阅读倾向上选择了使用电子产品阅读,而不是传统的纸质图书。一些专家慨叹,人们不再好好读书了。其实,在人类的书籍史上,曾经历几次重大的媒介转换,在每一个转折时期,都不乏怀旧和哀叹的声音,但這些声音最终被淹没在奔涌向前的历史洪流之中,人们最后总会张开双臂拥抱新媒体带来的好处和机遇。在知识由口传向书写转化的关头,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抨击书写让人产生对文字的依赖,不再练习记忆,令人头脑简单,远离智慧。印刷术发明后,印本逐渐取代抄本时,苏轼、叶梦得、朱熹都曾对人们因为印本易得、不

再认真读书而忧心忡忡,他们怀念那个为了读一部书而辛苦抄写、反复咀嚼的时代。

长远看,电子媒介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主流,即便是那些伤时恋旧的精英学者,其阅读生活也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。离开了大量网络数据库和电子读物的支持,他们的研究就会落伍;拒绝网络、手机等新媒体,他们就无法及时获得最新的学术信息。

与此同时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传统纸质图书不会退出历史舞台。二三十年前就有人预言过纸书的消亡,但直至今日纸书的出版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态势。历史上印刷术发明以后,抄本并没有绝迹,仍然在人们的读书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印刷术发明数百年后的明朝正統年间,中央政府藏书中仍有超过2/3的图书是抄本。目前纸书和电子书各有所长,难以相互替代,纸书不够轻便,没有检索、互动等功能;电子书缺乏“书香”,对照展读不便,阅读体验不佳。两者相互补充、相互融合,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。从积极的角度看,阅读神圣性的消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人们手把一屏,靠在沙发上、躺在床榻上阅读,在喧嚣的闹市阅读,在晃动的车厢里阅读,难道不是让阅读变得更加便利、更加随性、更加惬意了吗?难道不是让书籍拥有了更多的读者,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入读者队伍中来了吗?在这个意义上,新媒体对于推动全民阅读可谓功莫大焉。

同类项偏好

沙 爽

友人策划了一场读书分享活动,邀我参加。一听分享活动的地点在一家我未曾去过的书店,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。回头把自己近几年读过的书粗略默想一遍,我决定将《在西伯利亚森林中》拿出来谈谈。这本书的作者西尔万·泰松,在我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,19岁就开始旅行和探险,曾经与好友一起骑着单车环游世界。2010年,他决定完成此前对自己的一个承诺:在40岁前到森林中过一段独自隐居的生活。在出发之前的采购中,他自嘲:“亨氏品牌旗下销售约15种番茄酱……正是由于这类事情,我才想离开这个世界。”

只这一句,我就喜欢上他了。就像当年读到那句“镜子是热的”,我便由此记住了安妮·迪拉德一样。生命中的趣味和喜悦来自诸如如此的微小细

节——谁说不是呢?

然而过了几天,我收到了正式通知,这才意识到《在西伯利亚森林中》并非一个很好的选项。西尔万·泰松在森林中住了整整6个月,几乎每天都写一篇日记,他的书写极度自由,好像并不是寄身在那样一个小小的木屋,而是徜徉在无限广阔的天地之中,但这其间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故事,供我一口气聊够活动要求的时间长度。作为一个欠缺经验和水准的讲述者,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。

随即我明白了:我并没有像自己此前坚信的那样“吃透”这本书。因为初次邂逅的感觉过于惊艳,我当即买下了泰松被译介到国内的另外两本书,其中《走在幽暗的小径上》的译者也是周佩琼。在我看来,无论是文字还是节奏,周佩琼的翻译都完美呈现了泰松文本的特色,两下里堪称珠联璧合。但是,

我该怎样向别人介绍这一大捧异彩纷呈的珠玉?它需要首先在我的内心连缀成一件艺术品。

于是我放弃了西尔万·泰松,决定转而推荐特德·姜的科幻短篇集《你一生的故事》。这是一条取巧之径,除了被拍成电影《降临》的首篇小说,还有7个精彩的科幻故事,连同它们的象征意义,以及可能带领我们进入的未来生活——在较为专业的分类中,特德·姜的作品被归类于“硬科幻”,也就是说,小说中展现的种种并非仅仅来自天马行空的想象,而是基于现阶段科学成果而进行的技术推演。

事实证明,我低估了听众们的阅读层次,他们并不需要故事来提神。茶歇时间,我添加了几个与会者的微信。其中一位颇老老师,他分享的是李银河的《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》。意识到他

喜欢灵性方面的作品,我当即向他推荐《在西伯利亚森林中》,他果然一见倾心,对我说:这就是法国版的《瓦尔登湖》嘛!过了几天,他发现《在西伯利亚森林中》已经被拍成了同名电影,赶紧推荐给我看。

还有一个叫琪琪的1994年出生的小女生,圆脸,戴一副金丝边眼镜,笑起来很甜,让人莫名地生出信赖感。她大学里读的是工科,在读书方面涉猎广泛,业余最大的爱好是逛书店和图书馆。没想到,我居然会和一个90后一见如故,聊起来忘了时间。她说她刚读完《薛兆丰经济学讲义》,感觉很对口味。听她这么一说,我当即下单买了一本。

或许,这世界的惊喜在于,无论我们之间存在着多少不同,只要有那么几本共同热爱的书,就会像化学反应一般,自动生成一个合并同类项的美妙过程。

忧虑注定与我们如影相随

祝新宇

开头描述了主人公的童年,小主人公告诉医生,他不想写作业了,因为不断膨胀的宇宙总有一天会分崩离析,如此巨运降临中,他没有写作业的理由。面对此情此景,我们付之一笑,但是,当我们深入思考忧虑,会发现这种类似担心天塌下来的忧虑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。

今天,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、抑郁或忧虑。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弗朗西斯认为,忧虑是一种外延很广泛的词语,可以视为是焦躁、焦虑的一种形式,一种体现在精神上的不确定以及被不断扰乱的状态,它包括抑郁、沮丧、颓废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。但忧虑并非是一种疾病,对它也无法下一个精确的定义。忧虑本身因人而异,表现形式复杂多变,这恰好吻合文学的特征。高尔基认为,文学即人学。弗朗西斯从文学入手,兼顾其他方面,梳理了忧虑的前世今生。

无病呻吟,最早指的是疑病症,一种总是怀疑自己患有某种疾病的心理状态和身体反应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夏洛蒂·勃朗特在其小说《维莱特》中,细致地塑造了一个疑病症患者,“坐在那里的原来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受难者——一位神经紧张、意气消沉的人。那双眼睛曾经看到过一个鬼魂的造访——曾经长久等待那个最不可思议的幽灵‘疑病症’的忽隐忽现”。勃朗特准确地抓住了疑病症焦躁循环往复的特点。而焦躁不安正是今天人们的普遍特点,且有年轻化的倾向。所谓逃避远房亲戚的工资盘问和

父母催婚而不愿回家过年、定下一个小目标,等等,都是忧虑和焦躁的具体表现。这是社会进化造成的,即使你摆脱了这几个忧虑,还有更多的忧虑在等着你。早在20世纪,现代主义诗人T.S.艾略特把它描写为“在我的脑海中,沉闷的节奏开始啾啾(tom-tom)地敲”。艾略特有时被人叫作汤姆,即Tom,他巧妙地将自己的名字与象声词融为一体,实现了文学意义上的双重自我,形象地比喻外在的社会性自我与内在的苦闷自我。这说明了人类忧虑的源头:与社会性目标实现、自我目标实现密不可分。弗朗西斯总结说,“忧虑逐渐渗入对现代生活的虚构文学表现中——它常常与新的城市和郊区生活,与现代人的工作压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”。

弗朗西斯直言不讳:现代都市生活是罪魁祸首。这个判断放到任何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都很准确。中国正在快速前进,我们也面临着他人曾经面临的问题,忧虑和压力有关,也与萎靡不振有关,而后者恰恰是前者的产物。网上流行的“佛系青年”“躺赢”“三和大神”等,都是这种情况。它们带来的最终后果只能是负面的。英国诗人奥登在诗歌《某晚当我出去散步》描述了忧虑如何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,他感到忧虑使“生命似乎渐渐黯淡”。令人担忧的是——这种担忧其实不正是一种忧虑吗——忧虑几乎不会在顺其自然中痊愈,反而会不断地返回忧虑本身。

忧虑是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,很多作家对此有过精彩描写。这个事实是不是也在暗示作家也饱受其苦呢?英国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有部著名的小说《到灯塔去》,小说主人公拉姆齐是位每天为自己的作品而忧心忡忡的作家,原型来自伍尔夫的父亲,有趣的是,伍尔夫的父亲就是作家,并且写过有关精神痛苦的文学作品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传世名著《尤利西斯》的主人公布鲁姆的忧虑则比较贴近我们普通人,他常常担心自己的家庭和婚姻。弗朗西斯用这两部小说试图证明,忧虑这个标签,已经牢牢地贴在了20世纪英语文学上。实际上,当我们深入文学,无论哪个时期、哪个国家,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有关忧虑的影子。文学这个筐太大了,大到足以装下任何东西。但这并不能否认文学生动再现,突出了人的忧虑,甚至文学本身也是忧虑的一种形式;阅读《到灯塔去》《尤利西斯》这两部典型的意识流小说,不会让大多数人感到快乐。

通过对这些小说文本的分析,弗朗西斯认为,打败忧虑,需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爱,承认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性。《尤利西斯》里的布鲁姆对婚姻的担心,其实是出自妒忌,《到灯塔去》里的拉姆齐先生善于陪伴孩子,则过于以自我为中心,忽略了家人。在现实中,我们的情况恰好相反。例如为人父母者,常常为出门的孩子担心。

市场经济高速发达的当下,想要反映忧虑的文学面临着新的课题,例如人们面对诸多选择权

时的忧虑和困惑。诸多选择,不仅是饭店的菜单、遥控器上的按钮、同质化的商品,并且体现在教育环境选择(该为孩子报哪种学前班)、职业选择(我该不该跳槽),甚至体现在整容上(我到底适合尖下巴还是圆下巴)。弗朗西斯对此嘲讽说,在这样一个社会里,成为素食主义者减少了点菜时的挣扎。

文学中有可能隐藏着一部“忧虑史”,但文学绝不会专门地、单独地为忧虑服务。忧虑作为人的情绪或心理状态之一,必然被文学所表现,而我们不该过度阐释。弗朗西斯有些犯这个毛病。例如他认为莎士比亚的讽刺喜剧《威尼斯商人》里的鲍西娅是位忧虑者,弗朗西斯可能是第一个认为鲍西娅具有如此特质的文学教授,他的根据是,“忧虑者尤其善于觉察语义的歧义”,因此鲍西娅才能用只能割肉不能流血的说辞赢得了官司。

弗朗西斯说,当他界定这本书的性质时,感到了忧虑。《忧虑》不是史书,也非文学研究;它不提供医学方面的意见,也不鼓励读者主动克服忧虑;尽管书中有哲学思考,但忧虑不能称之为哲学。弗朗西斯欲在人类文明的最大范围内追溯忧虑的历史,因此他的话通常常点到为止,他甚至聊到了忧虑在雕塑和音乐上的表现。这种写法如同吃一顿菜品丰富,但菜量极少的大餐,每一样我们都吃了一点,每一样吃着都不过瘾。于是,读完这本书的我也感到了忧虑。

■聊书

京剧,真美啊

丁春凌

看书记不住就不看?为啥非得记住?又不是放下书就要去职称考试。别找借口了。在阅读这件小事儿上,你总不能一直处于准备状态。无穷准备。

《了不起的游戏》

在这本书里,郭宝昌将京剧的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捋了一遍,从唱腔、唱词、叫好到角儿,挑明了说,咱们有230年历史的京剧究竟都好在哪儿?整本书像聊天,啰唆得很耐看。中间还讲了圈儿里的一些掌故、趣闻,看得大笑。饶是这样,懂京剧的人,看京剧的人,还是不多。用郭宝昌的话说:现在,喜欢京剧的人越来越少了,特别是年轻人。烤鸭、饺子、涮羊肉全部爱吃,天坛、故宫、颐和园也都欣赏,电影、话剧、电视剧全能接受,唯独京剧不看。说是老古董,是给老人们看的,哪咻呀呀听不懂。这就太奇怪了,你一次京剧都没听过,怎么就知道听不懂?95%的年轻人不喜欢京剧,都是一次也没看过的。想想,还真是。郭宝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学过京剧,拜过师。他在书里说,马连良管他母亲叫四婶。从童年时看戏,少年时迷戏,青年时成了戏痴,中年时思考,到暮年时研究,他在圈儿里前后70年,是真的懂。看书时,我用手机放着京剧当背景,一出又一出。京剧,真美啊!尤其是唱腔,一点儿不输西方的歌剧。

《字游上海》

有没有想过,你每天看见的马路边的招牌,1年前,5年前,10年前,都是什么样儿?往后说,20年后,30年后,50年后,又会是什么样?以前,走在街上,我总会注意两边的招牌。自打去年,家附近的街头招牌一水儿地都换成了白底蓝字的样子后,就没兴趣看了。《字游上海》拍的都是上海各处的字迹。全书收录了360多幅图,它们来自街道、弄堂、建筑、工业遗迹、商铺、摊贩、广告、机构、村镇等角角落落。你甚至无须从第一页开始看,翻开任何一页,就进入了时光隧道——某块招牌上的字迹记录的过往。

我看到那些黑板报的字体时,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做过的黑板报。作者姜庆真真是个有心人,有积累意识,很早就开始拍这些了。其实,书中记录的字迹大部分都消失了,所幸,还有40多处尚存。有机会去上海时,可以去实地看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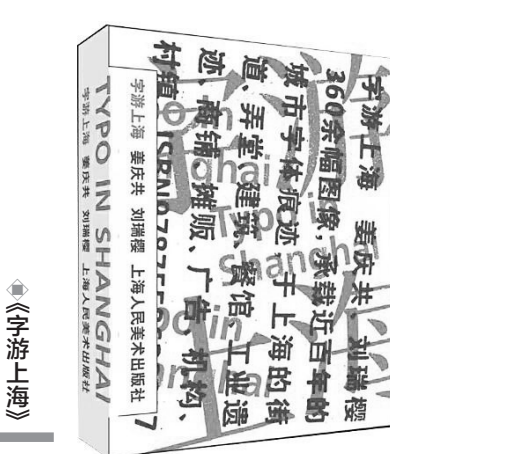
《丘吉尔传》

看过的相当中肯的一本丘吉尔传。在上世纪的英国历史中,乃至世界历史上,温斯顿·丘吉尔都是一座难以超越的丰碑。我看这本书,是因为最近在追英剧《王冠》,剧中丘吉尔在乔治六世去世时的演讲,用心至深,用词至美,印象太深了。联想到二战电影《至暗时刻》里他那段永不屈服鼓舞人心的演讲,我确信,他真的是一个人在背负着整个英格兰的命运。嗯,想过英语六级的,建议那两段都背下来。这本传记对丘吉尔的缺点,不掖着藏着,戏谑时候,我甚至认为作者和丘吉尔有仇:他睁开眼就喝酒,赖床,穿着睡衣办公,脾气阴晴不定,鲁莽而暴躁,和他共事的人苦不堪言。但是,他在工作上永不疲惫的状态,大处着眼的格局、哪怕是最绝望的情况下也能幽默一下的聪明,还有他那时不时就感动落泪的柔软心地……书里全是这样的细节。丘吉尔的祖上也做过首相。基于这个家庭背景,我彻底明白了他对几乎所有人的观点一直保持审视、质疑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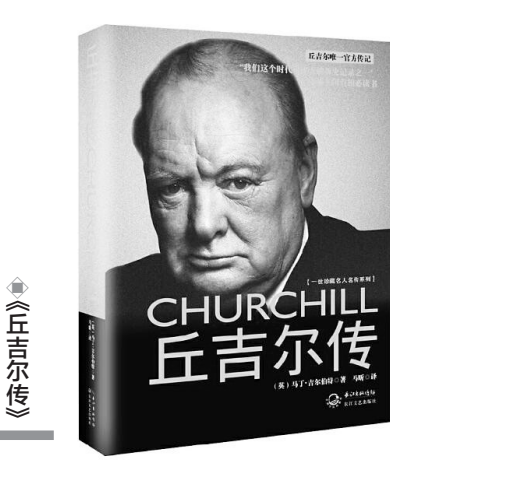
《了不起的游戏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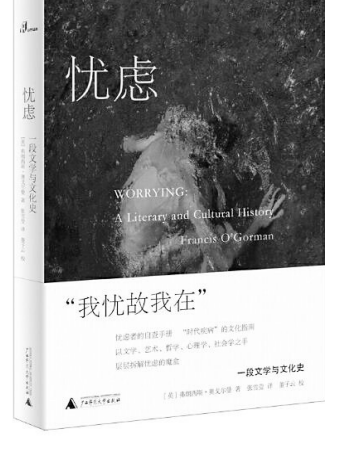
《字游上海》



《丘吉尔传》



提示 人类拥有最复杂的情感,忧虑是其中较为隐秘的一种。《忧虑》的作者弗朗西斯认为,自文明诞生以来,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忧虑,而弗朗西斯试图通过研究这些学科下的人类情绪变化,更深刻地探究忧虑是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,以期寻找纾解忧虑的方式。



中国典籍《列子》上曾描述过忧虑问题:“杞国有人,忧天地崩坠,身亡所寄,废寝食者。”杞人忧天后来成为形容没有根据、毫无用处的忧虑的成语。无独有偶,美国电影导演伍迪·艾伦有部喜剧片《安妮·霍尔》,荣获了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,电影